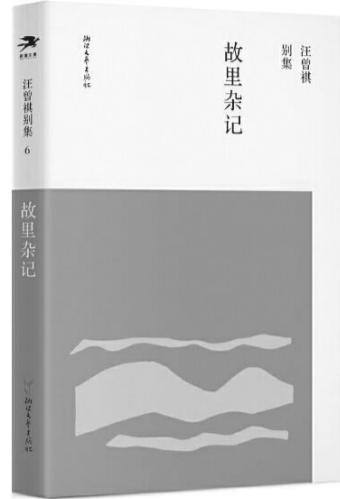


汪曾祺的三别

祝新宇



有这样的小小的不守规矩，册子就活泼起来，读着亦有变化感。

我也喜欢《别集》的软皮，32开本。如今出名家集子，动辄精装，再不济也是所谓的简精装，价格吓人，外形也硬邦邦地拒人千里。而软皮书不仅捧读舒服，且外出亦便于携带，《别集》这种开本，有些口袋书的意思，稍大点的衣兜即可装下，很符合欧阳修提倡的读书“三上”。现在的生活节奏快，时间宝贵，能够随取随读的书籍还是多多益善。

最早读汪曾祺的文字当然也是他大名鼎鼎的《受戒》。那还是30多年前在中学课本上，影响深刻的还有孙犁的《荷花淀》。当时读着就觉得和其他作品不一样，到底哪儿不一样，说不上了，老师也不教。后来眼界渐宽，阅历渐长，方能品出一二。

汪曾祺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与他相似的还有孙犁，可惜孙老先生没有“别”到底。当然，说汪曾祺就不能不提及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中学时代的汪曾祺，曾随家人到一座小庙里避难——就是《受戒》里的那个茅茅庵——当时日本人要打过来，他仅带了两本课外书，其中一本就是《沈从文小说选》。而汪曾祺的第一篇作品，《小学学校的钟声》，即是“经沈先生介绍出去的”，汪曾祺在1981年的小说集《寂寞和温暖》自序中这样说道，那时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也是他文学创作初期，可惜那个时期的习作，“都已散失”。包括沈从文在

内，这三位作家的共同之处是受外界干扰很少，坚持自身的文学思想，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如果做不到，索性辍笔或转行。孙犁后期虽恢复写作，却是以随笔为主。沈从文则转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没有太长时间的中断，他对文学的理解亦一直体现在笔端，即使是写样板戏的时候，也要“把京剧写得像个京剧”（《关于〈沙家浜〉》，汪曾祺，1991年）。《沙家浜》第四场“智斗”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并且留下了“人走茶凉”的成语。

尽管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汪曾祺也是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但他应该属于“大器晚成”的那一小撮作家。这是汪曾祺的一“别”。1979年至1981年，汪曾祺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受戒》《异秉》和《大淖记事》，此时他已年过花甲。彼时，文坛掌旗人物疲态渐露，包括曲波、浩然、杨沫在内的主流作家，其“创造活力已难以维继，有的逐渐停止写作，有的虽仍然发表作品，却不愿或无法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整体的陈旧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些现在看来的重要作家，例如王蒙、张贤亮、陆文夫、从维熙、刘心武等，着重于解放思想，解放人性，文学主题几乎与刚刚过去的那个特殊时期有紧密联系，因此带出了后来出现的“反思小说”和“伤痕文学”。而我们更熟悉的莫言、阿城、北岛、史铁生、余华等尚在破土、萌芽状态。此时汪曾祺出现了，《受戒》出现了。孙郁说，汪曾祺出现在80年代是个奇迹。阿城说，《受戒》看完如玉。

说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启下的人物有些夸大，但汪曾祺当时的一系列作品，仿佛是置于大鱼大肉席上的一个龙井，不仅令人眼前一亮，且有解腻清神之功效。他的某些作品，可以说是80年代末期兴起的“寻根文学”之发轫。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足以涤荡我辈之充满欲望以及消化不良的肠胃。

以《受戒》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大环境影响，这也是汪曾祺的一“别”。汪曾祺说他只想写人性的健康的美，及其他。汪曾祺直言，“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1991年）。《羊舍一夕》里的4个少年，小吕、老九、留孩和丁贵甲，就是《受戒》里的明海，是和鲁迅的少年闰土与阿发，沈从文的翠翠一路沿袭下来的。同时也是汪曾祺年轻时的自己，他曾说过明海、小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话。换言之，作家写反映时代，批判社会的作品，也可以写与时代、社会不那么紧贴，但却始终存在于人性中的美好。汪曾祺不是不写人性黑暗的一面，例如《岁寒三友》里的王伯韬，《大淖记事》里的刘号长，都是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他们都是用来反衬好人的。所谓好人，即人性中率真、未被污染的那一部分。一个作家，能秉笔直书，不顾及当时仍笼罩文坛的主导思想，亦是难能可贵和富于勇气。

话说回来，汪曾祺的作品并非是在象牙塔里写出来的。他声明“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必须先论世，然后可以知人”（《晚饭花

集》自序，1983年）。在一个掩藏内心真实欲望，花鸟鱼虫不受欢迎的时代，去写健康的人性和花花草草，不正是一种批判吗？这样的写法在古今中外绝罕见，例如陶潜的《桃花源记》，与他写作时的社会状态完全相反。幸运的是，汪曾祺以及我们向往的生活不久便实现了，虽然这并非是文学的功劳。

汪曾祺的“别”，还体现在他关于文学形式的观点。“我的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可以视为别裁伪体”（《茱萸集题记》，1987年）。所谓“别裁伪体”，指的是汪曾祺欲打通散文与小说之界限。汪曾祺不止一次说过，《世说新语》《项脊轩志》以及很大一部分中国古代笔记都是小说。文无定法在汪曾祺这里得到了淋漓的体现。他的一些作品的确如此，不能严格地定义为小说或是散文。他在《茱萸集题记》里说，“我的作品倘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我不会写别人那样的作品。”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文学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形式的本质，基本上都是用来突破和创新的。把散文和小说的界限定的死死的，才是陈腐之见。当然，他的作品也非篇篇皆佳作，例如个别散文中过多提及了当地官员和商人，删掉这些无损文字质量，他的某些小说，我觉得也一般般，但这不是大毛病，甚至算不上“瑕”。

评论到此，我忽然有所醒悟，说汪老“别”，实际上是我们正经、严肃的时间太长了。如今，不止文学，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早已活泼起来，汪老健在时就感受到了，也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创作于晚年。

聊书 端午与物料

徵 羽

端午由包括且不限于龙舟、粽子、五彩丝线、香囊、菖蒲、艾草等各种物品打造出隆重的仪式感，实在是一个物料不少的节日。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对农业膳食、酒茶糖烟、纺织服装、建筑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器、科学技术等做了全面贯通精到的讲解。作者孙机是一位有工匠精神的学者，他对异想天开、严重失实的影视道具和小说情节加以驳斥，也对某些历史记载如郑和宝船的尺寸有过合理质疑。

很多原来读书时想当然的东西从这本书里重获意义，比如《过秦论》里“流血漂橹”的橹是当时最大规格的盾牌，而非“橹橹灰飞烟灭”的橹（船桨），以之极言战争之惨烈。《诗经·小雅·斯干》中“弄瓦之喜”的瓦是陶制纺锤而非瓦片，这又令人想起西方童话《睡美人》中的公主所受诅咒乃被纺锤刺破手指而死，看来自某个年代里，以纺织为女子本分的观念是无问东西的。

《傅山的世界》

“回归经典”向来是思想、学术和文艺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文艺复兴、古文运动乃至清代考据学莫不如是，傅山的个案展示了书法史上的追本溯源。

时至明末，二王以来的帖学传统日益受到质

疑，明末社会“尚奇”，以《拍案惊奇》《今古奇观》命名小说集就是证据，傅山的书法也由此呈现奇谲繁复的面向。明清易代之后，在对明末风俗的反思背景下，学术观念由奇入朴，傅山的书法转向了更古奥的碑学，呈现出支离丑拙的风格。书法观念的激变正是晚明“尚奇”的文化和清初古典学复兴的综合产物，而特殊的身世和境遇使得这两种潮流在傅山身上融汇结合，使他成为书法史上由帖学入碑学的窗口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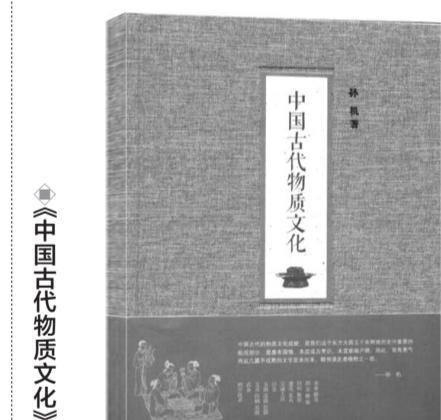
书中对傅山等博学鸿儒与清初汉族官员的关系做了考察，指出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庇护人和赞助者，两者并非想当然的人各有志、水火不容。

《致命元素》

古人认为端午是五毒日，王猛为此日出生的孙子取名王镇恶，而白素贞也是在这一天喝了雄黄酒现出了蛇身，所以民间衍生出门悬艾草以辟毒祛祟的风俗。

毒药，距离生活并不远。《致命元素》介绍了汞、砷、铅、锑、铊五种有毒元素的故事。“是药三分毒”，反过来理解也成立，毒药也有其特殊价值，汞、砷、铅、锑、铊不但有着广泛的工业用途，甚至在历史上曾长期被用作药物治疗某些疾病，当然，因为工艺、剂量等原因，人类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圣赫勒拿岛的朗伍德宫所用的壁纸颜料中被检测出含有大量的砷，囚禁于此的拿破仑大概死于壁纸造成的砷污染，而对贝多芬头发的检测则证明死因是慢性铅中毒，人们猜测他误用滥用了某些含铅药物。

为了消解严谨的化学知识的枯燥，作者还从英美刑事档案中发掘出大量毒药谋杀案例，除了形象地展示了毒药之毒，还让人感受到了惊然的人性之毒，提醒人们人性深处总有复杂阴暗的一面，一定要警惕毒药成为召唤罪恶的催化剂。



理解“伟大” 读懂时代

单天明

美好的礼物。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对和平的向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一带一路”建设受到沿线国家的热烈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出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英国学者雅克认为“中国道路”是一条共建共享共治的文明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对世界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当下，中国政府站在道

义和行动的两个制高点，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为人民担当、为发展中国家担当、为全人类担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

正如作者在《伟大的事实》中总结的那样：中国现代化道路核心是社会主义，逻辑线索是强调发展的伦理目的——实现“共同富裕”和“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凸显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这些伟大理念和实践创举，只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下才能够孕育生成。这种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是我们骨子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表达。

（作者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代科学的人文书写

曲 宏

科学发现的故事浩如烟海，赵致真探索的是科学的根脉和渊源，从中提取人文价值，用社会意义的逻辑来谋篇布局。《播火录》以恢宏的视野，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到地质学、环境学等领域，以人们科学盲点为线条，采集那些蕴含人文情怀的故事。如果说爱因斯坦、彭加勒、范布伦、哈勃、奥本海默、居里夫人、富兰克林、雅洛等科学家的故事里，科学精神是灵魂的话，那么，诺贝尔、索尔维、斯坦福、卡文迪许、史密森、卡内基等慷慨捐助科学研究、教育事业的企业家或富豪的故事，则体现着“个人财富融入人类的科学事业，将会千古流芳和与世长存”的深刻内涵。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饱含着崇高的人类理想，这也是讲述中不显生硬的原因所在。

科学家们续写了普罗米修士把火盗到人间的故事。作者挖掘了科学探索的大无畏精神和利他行为的价值意义，这是科学发现留给人类的另一个独特的价值。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无数科学家甘冒巨大风险，探索科学的真知。人类的点滴进步，都饱含着科学家们付出的高昂代价，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

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故事，往往容易写得干瘪无趣，但作者却写得兴趣盎然。他一方面用文学的手法把科学家还原为活生生的人。无论是牛顿用锥子

插进自己的下眼眶，尽量逼近眼球后部，通过“海底捞月”感知色彩，还是爱迪生最得力的助手达利因长期X光照射导致癌变，右手4个指头和整个左手截肢，此后又截掉两只胳膊，都是触动人心情感的故事。赵致真的笔墨重在讲故事，对专业的描述，则尽量简洁又通俗易懂。可能是拍摄电视片的缘故，他的文字很多都有画面感，消除了科学知识的枯燥和单调。居里夫人手持铁棒在大锅中奋力搅拌沸腾的沥青矿渣，因过多承受辐射和补的辐射而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法国科学家希厄尔·弗莱米奈特死于他发明的潜水循环式再呼吸器故障；巴纳德在漫长的冬夜观察星空，鼻子冻在目镜上而撕掉了皮肤；德国医学家罗伯特·本森在研究剧毒易燃的二甲胂的实验中发生爆炸，他掀开了面罩，玻璃碎片飞进其右眼造成永久失明，1868年实验室又发生钝和铱金属粉末爆炸，几乎夺去了他的另一只眼睛；以发现X射线的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名字命名的伦琴学会1920年举行晚宴时，多数人对端上来的烤鸡无福消受，因为断指残手、缺膀少臂而不能使用刀叉。这一个个镜头画面，生动的细节扑面而来。当文字有了视觉效果时，传达出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

另一方面，以图证史，一图胜千言。书中1400多张图都是从各国档案深处挖掘出来的，用插画、图表、照片、雕像、漫画、笔

记来记录科学历史，而且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有时整个版面都是图片构成的。图像本身就是史料，把图像作为史料研究已经是一种研究趋势。图像作为人类精神各个发展阶段的见证，是历史的遗留，里面包含着许多潜藏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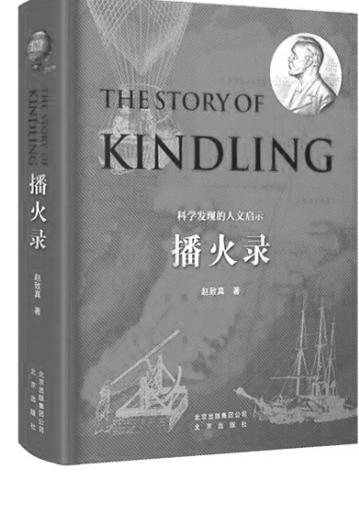
除了注重视觉语言外，作者对史实的匡谬归真，则闪耀着理性之光。他的主要时间花费在查找文献和搜寻资料上，还有甄别判断上。许多深邃明澈的思考散见于字里行间，人类在仰仗科学恩惠时，曾因误用和滥用科学而受到的惩罚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代价。

赵致真不但客观反映一些争议问题的原委，也反映人类的权衡取舍。以乙基汽油为发动机带来更大马力，却把沉淀在我们和后代子孙的骨骼里。X光开创了医学影像的新天地，X射线天文学为研究脉冲星、超新星和黑洞提供了“瞭望台”，但也对人类造成过重创。氟利昂在给我们带来舒适和便利的同时，也对臭氧层造成了大破坏。还在延续的DDT存废之争，从描写农药对环境污染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出版到125位专家用900多页的考察报告维护DDT以及法官斯威尼的判决，争论的焦点和核心是围绕DDT预防疟疾的独特效用而展开，反映了人类社会丰富而复杂的一面。对这些科学发现，怎样权衡，对人类则是重大考验。而赵

致真对诺贝尔奖的另眼观看，则在诺贝尔奖权威的光环里，看到了瑕玼和缺憾。诺贝尔奖既有伟人巨匠的慧眼卓识，也有凡夫俗子的明来暗往，更有“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标准。1943年罗格斯大学23岁研究生萨兹从农家庭院土壤中分离出链霉菌株，但实验室主任兼导师瓦克斯曼却把链霉菌的发现权据为己有。1952年瓦克斯曼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时候，尽管法院已经明确判决，链霉菌发现权归双方共有，但结果是萨兹依然与诺贝尔奖无缘。赵致真将诺贝尔奖的大部分争议归咎于它的“体制”和“政策”，显现了他对问题认识的深度。比如，诺贝尔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科学家。美国医学科学家柏森和女科学家雅洛共同创建了精确测量多种生化物质的放射免疫检验法，但1977年雅洛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已经去世的柏森就不能一荣俱荣了。对诺贝尔奖的公平性提出的质疑有理有据，给人以理性的心态和豁达的人生境界。

除了哲理的色彩，《播火录》文字间还充盈着文学的诗意。那精炼的文字，珍稀的图片、制作精良的视频，三位一体，交相辉映，增加了《播火录》的内涵，也展现了纸质书籍和数字世界互动的全新姿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部精美的艺术品，满满的正能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其现实意义是深远的。

提示
播火者，指的是那些传播科学与真理的先行者。对科学世界播火者的历史探寻，不可避免地带着人文足迹。考察科学事件的价值，也常常需要在人文层面进行深度开掘。《播火录》讲述的是一部生动的世界近代科学史，展现的是科学家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书写了人类在探索自然奥秘漫漫征程上的人文启示。它开阔的历史眼界、大跨度的选材、厚重的文化容量、深刻的历史认知，凝聚了作者赵致真和他的团队的心血与努力，使科学与人文深度融合，从而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聊书 端午与物料

徵 羽

端午由包括且不限于龙舟、粽子、五彩丝线、香囊、菖蒲、艾草等各种物品打造出隆重的仪式感，实在是一个物料不少的节日。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对农业膳食、酒茶糖烟、纺织服装、建筑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器、科学技术等做了全面贯通精到的讲解。作者孙机是一位有工匠精神的学者，他对异想天开、严重失实的影视道具和小说情节加以驳斥，也对某些历史记载如郑和宝船的尺寸有过合理质疑。

很多原来读书时想当然的东西从这本书里重获意义，比如《过秦论》里“流血漂橹”的橹是当时最大规格的盾牌，而非“橹橹灰飞烟灭”的橹（船桨），以之极言战争之惨烈。《诗经·小雅·斯干》中“弄瓦之喜”的瓦是陶制纺锤而非瓦片，这又令人想起西方童话《睡美人》中的公主所受诅咒乃被纺锤刺破手指而死，看来自某个年代里，以纺织为女子本分的观念是无问东西的。

“回归经典”向来是思想、学术和文艺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文艺复兴、古文运动乃至清代考据学莫不如是，傅山的个案展示了书法史上的追本溯源。

时至明末，二王以来的帖学传统日益受到质疑，明末社会“尚奇”，以《拍案惊奇》《今古奇观》命名小说集就是证据，傅山的书法也由此呈现奇谲繁复的面向。明清易代之后，在对明末风俗的反思背景下，学术观念由奇入朴，傅山的书法转向了更古奥的碑学，呈现出支离丑拙的风格。书法观念的激变正是晚明“尚奇”的文化和清初古典学复兴的综合产物，而特殊的身世和境遇使得这两种潮流在傅山身上融汇结合，使他成为书法史上由帖学入碑学的窗口人物。

书中对傅山等博学鸿儒与清初汉族官员的关系做了考察，指出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庇护人和赞助者，两者并非想当然的人各有志、水火不容。

古人认为端午是五毒日，王猛为此日出生的孙子取名王镇恶，而白素贞也是在这一天喝了雄黄酒现出了蛇身，所以民间衍生出门悬艾草以辟毒祛祟的风俗。

毒药，距离生活并不远。《致命元素》介绍了汞、砷、铅、锑、铊五种有毒元素的故事。“是药三分毒”，反过来理解也成立，毒药也有其特殊价值，汞、砷、铅、锑、铊不但有着广泛的工业用途，甚至在历史上曾长期被用作药物治疗某些疾病，当然，因为工艺、剂量等原因，人类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圣赫勒拿岛的朗伍德宫所用的壁纸颜料中被检测出含有大量的砷，囚禁于此的拿破仑大概死于壁纸造成的砷污染，而对贝多芬头发的检测则证明死因是慢性铅中毒，人们猜测他误用滥用了某些含铅药物。

为了消解严谨的化学知识的枯燥，作者还从英美刑事档案中发掘出大量毒药谋杀案例，除了形象地展示了毒药之毒，还让人感受到了惊然的人性之毒，提醒人们人性深处总有复杂阴暗的一面，一定要警惕毒药成为召唤罪恶的催化剂。

